



评弹与上海

□沈鸿鑫

上海是我国南北戏曲、曲艺集散的重镇。从北京传来的京戏在这里盛行，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京剧；源于浙江的越剧在这里得到了发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剧种、曲种。而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祥，又是一个非常突出而富于典型意义的事例。

苏州评弹乃评话与弹词的合称。苏州评话是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元明的说书(平话)演变发展而来。明中叶时，南方已流行弹词，与苏州方言结合演变发展成为苏州弹词。评话者多为一人，只说不唱，表演上讲究说表、噱头、口技、手势、面风等，时以折扇、手帕为道具，以醒木击桌加强气氛。

传统书目以演绎历史故事和武侠、神怪故事为主，如《三国》、《隋唐》、《英烈》、《岳传》等。弹词又说又唱，散文与韵文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以说、噱、弹、唱为主要手段，注重模拟各种类型人物，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基本曲调有书调、俞调、陈调及费伽调、乱鸡啼、山歌调等曲牌、小调，伴奏乐器以三弦、琵琶为主。传统书目以家庭离合、爱情悲欢故事为主，如《珍珠塔》、《玉蜻蜓》、《三笑》、《描金凤》等。

一般认为，苏州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到了乾隆年间，苏州评弹已相当成熟，并广泛流行，出现了曾在乾隆御前弹唱《游龙传》的弹

词名家王周士等，苏州还创立了第一个评弹艺人的行会团体——光裕社。

一方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艺术。评弹传入上海后，它是怎样在这块奇异的土壤上滋生发展的？评弹艺术的发祥与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共生关系？它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都值得加以探究。

上海地区与苏州毗邻接壤，而且有些今属上海的地域原属苏州管辖，在地域上呈犬牙交错、相互渗透的状态；在方言方面，两地又同属吴语区，因此苏州评弹很早就在上海一些郊县集镇流传。清代中叶苏州评弹进入繁盛时期，当时涌现

了一批名家和名作。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评弹前四家——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其中毛菖佩即是上海宝山人。上海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弹词作家,如乾、嘉年间的弹词女作家朱素仙是松江人,作有弹词《玉连环》。另一位弹词艺人兼作家吴毓昌为上海金山人,编写过吴音弹词《三笑新编》。到十九世纪中叶,评弹大量传入上海市区。

一门艺术能不能兴盛,与其有没有相当数量的受众事关密切;而艺术的发展又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商路往往就是戏路。1843年,上海被辟为商埠,万商云集,经济繁荣,城市人口剧增,文化消费需求陡涨。上海五方杂处,但本地人、江苏人、浙江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同属吴语区,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相近,因此他们不仅听得懂用苏州方言演唱的评弹,而且乐于接受和欣赏它。这,就为评弹提供了数量甚大的基本听众群。

另外又有两次历史事件,给了评弹以机遇。一次是在1853年,因



■ 近人赵云睿绘光裕社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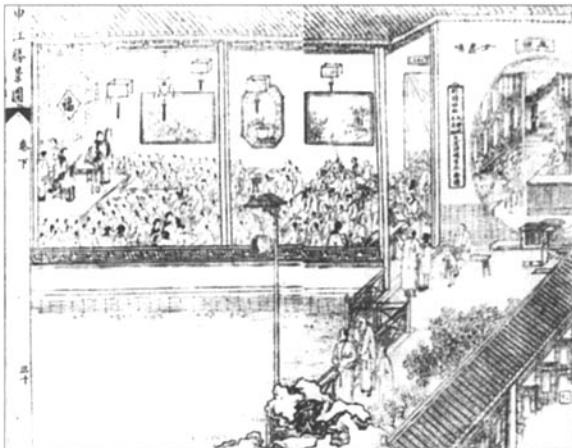
■ 苏州第一天门光裕公所旧址

太平天国战火燃起,江南一带的地主官僚纷纷逃至上海;一次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金融、贸易中心,人口骤增,文化消费需求也急剧上升,接着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并出现畸形繁荣局面,评弹听众的数量又有很大的增长。这两次事件,都为评弹在上海的生存和兴盛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

由于上海商机多,人气旺,为满足市民的需要,上海的评弹演出场所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书场——陆深旧宅。后来,这种茶楼书场逐渐增多,它一般上午卖茶,下午与晚上演唱评弹,如本市城隍庙北首的得意楼、福州路上的天乐宫、小广寒等。其中有一部分后来演变为专供评弹演出的专业书场,如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玉茗楼和创建于光绪四十五年(1890)前后的汇泉楼。汇泉楼演出频繁,有时一天开演四场,年终会书有时二十多档同场演出,通宵达旦。到了上世纪20年代,又新建了许多专业书场,设备有所改善,规模扩大至200座左右,其中著名的有雅庐书场、长乐

书场等。30、40年代,评弹市场更趋繁荣,场地更有了显著的拓展。30年代专业书场已有数十家,仅老城隍庙内就有得意楼、怡情处、四美轩、逍遥楼、蠡园、明园、柴行厅等七八家之多。紧接着,一大批新式书场纷纷开张,它们就是饭店附设的饭店书场和舞厅附设的舞厅书场。饭店书场中,著名的有东方书场、沧州书场、南京书场、中央书场等;舞厅书场中有米高美、仙乐斯、新仙林、维纳斯等。这些新式书场效仿现代剧场,采用现代化设备,场地宽敞,环境幽雅,座位舒适,适应较高层次听众和较大规模演出的需要。此外,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等大中型游乐场专门也辟有评弹场子,影响也很大。

书场多,演出旺,必然吸引大批评弹艺人纷至沓来。早在清末,评弹四名家马如飞、姚士章、赵湘舟、王石泉就都来过上海演出。民国初年,出现了著名的“三卿档”:——说唱《倭袍》与《珍珠塔》的王绶卿、说唱《玉夔龙》与《描金凤》的赵筱卿和说唱《描金凤》的钱幼卿。20年代有蒋一飞、蒋宾初、朱耀庭、王亦泉等名家。30、40年



■ 清末书场演出盛况(《申江胜景图》)

代更是名家云集，有以弹唱《描金凤》著称的夏荷生，说唱《玉蜻蜓》、以“阴噱”见长的周玉泉，说唱《三笑》、创造了“糯米腔”的徐云志，他们并称为“三大单档”。还有“三大双档”，他们是弹词《落金扇》的蒋如庭、朱介生；弹唱《啼笑因缘》的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此外还有严雪亭、蒋月泉、张鉴庭、刘天韵、黄兆麟、许继祥、杨莲青、张鸿声等众多响档。30、40年代，上海书坛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演员，男女双档、女单档、女双档、女评话开始活跃在上海书坛，其中佼佼者有徐雪月、醉疑仙、范雪君、黄静芬、朱慧珍等。其中，范雪君因演唱《啼笑因缘》、《秋海棠》、《雷雨》等蜚声书坛，40年代后期曾被听众选为“弹词皇后”。

听众踊跃，书场众多，名家云集，自然造就了评弹在上海的繁荣。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地缘关系和文化市场的需求。纵观评弹三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出现过三次兴旺时期——

第一次是清代中叶，其中心在

苏州。当时的评弹艺术趋于成熟，演出兴盛，涌现了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赵湘舟、王石泉等名家。

第二次是上世纪30、40年代，评弹进入鼎盛时期，重心移至上海。上海各式书场星罗棋布，许多广播电台

大量播送评弹节目，夏荷生等一批有创造意识的艺术家脱颖而出，所有评弹艺人已把能否进上海的书场演出、能否在上海立足作为艺术好坏的标志。听众十分踊跃，将听评

身于全国主要曲种的行列。

上海的文化，向来具有多元特征，南北戏曲曲艺荟萃于此，竞奏争艳。开埠以后，西方现代艺术纷纷涌入，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昆曲、京剧、大鼓、北方评书等在上海盛行，而西洋话剧、电影、交响乐、舞蹈等又都是最早从上海传入中国的。评弹，就是在这样多元文化浸润渗透和交互影响的特殊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它们为评弹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和艺术营养，有力地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创新发展和评弹艺术本体的完善提升。

“江南为橘，江北为枳”，艺术的发展和变异离不开所处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环境，主要指特殊



■ 张鉴庭、张鉴国弹唱《闹严府》

弹视为娱乐时尚，30年代初出版的《上海冶游备览》将评弹和京剧、苏滩并列为主上海的主要文娱项目。

第三次是建国后的50、60年代，这是评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革和繁荣时期，重心也在上海。蒋月泉、刘天韵等一些解放前就已成名的演员，艺术更臻成熟，并成为自成一派的艺术家，评弹的演出更加活跃，艺术的样式更加多样，艺术本体得到全面提升，评弹已跻身

的文化背景和听众观众的审美取向。

评弹进入上海时，面对的是一个商业繁荣、五方杂处的大都市，生活节奏快，听众欣赏要求也各不同。评弹要想立足上海，必须要适应这种环境。为此，早在民初和20年代，一批出身于上海或主要活动在上海的评弹艺人，就尝试编演新书目。评话艺人程鸿飞演说的《岳传》与光裕社的传统脚本不同，

他依据《金史》、《宋史》的记载，对书中人物的身世脉络逐一理清，重新编排情节，所起脚色也与别家不同。加上他还把自己游历南北的所见所闻和生活经历补充到书情中去，因此他的《岳传》被称为“野岳传”。此外，朱寄庵和朱兰庵、朱菊庵父子改编、弹唱的新书目《西厢记》，早年在上海新舞台拉幕的范玉山根据京剧连台本戏编成的长篇评话《济公》，其情节、结构与别人所说的评话《济公》不同。它们的情节尤为曲折，戏剧性强，还将不少戏曲动作引用到书中，所起角色别具一格，范玉山也获得了“活济公”之誉。

还有一种以近代史实为题材而编写的评弹新书目。弹词艺人李文彬把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实事编写成长篇弹词《杨乃武与小白菜》。评话艺人朱少卿把发生在清同治九年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实事编成评话《张汶祥刺马》。程鸿飞还根据新舞台演出的京剧连台本戏《鄂州血》改编成同名评话，描写了武昌起义中革命党人、起义官兵奋起攻击总督府的壮丽一幕。这些新书目的出现，贴近了都市听众的生活，适应了都市听众的审美需要，无论对评弹书目的扩大还是评弹本体艺术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30、40年代评弹演出更为兴旺，进入了鼎盛时期。一些评弹艺人对传统书目作了打磨加工，如夏荷生弹唱《描金凤》红极一时，被誉为“描王”。弹唱《珍珠塔》的沈俭安、薛筱卿都是魏钰卿的弟子，说表大方，配合默契，两人在马调基础上各自发展成独特的流派唱腔——沈调与薛调，成为继马如飞、

魏钰卿之后弹唱《珍珠塔》的又一高峰，被称为“塔王”。

与此同时，一些艺人积极编演新的书目。张鉴庭在30年代根据同名宣卷改编的长篇弹词《十美图》，写明嘉靖年间曾家与权奸严嵩之间的忠奸斗争以及曾荣兄弟的婚姻纠葛。张鉴庭还根据唱本《一餐饭》改编成长篇弹词《顾鼎臣》，写林子文的冤狱以及顾鼎臣相助的故事。杨振雄根据传奇剧本及其他史料改编的长篇弹词《长生殿》，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

和唐朝的兴衰故事。还有根据社会实事或小说等编写的近现代题材的书目，如朱耀祥、赵稼秋弹唱的《啼笑因缘》，范雪君弹唱的《秋海棠》是分别根据张恨水和秦瘦鸥所写的小说改编的。而评话《山东马永贞》、弹词《枪毙阎瑞生》、《黄慧如与陆根荣》等，则都是根据发生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编写的。这类近现代题材的书目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共鸣，所以较受欢迎。

评弹的演出样式和弹词流派唱腔，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过去评弹一般是一人坐唱的单档，30、40年代双档演出形式崛起，开始只有男双档，后出现了男女双档和女双



■ 刘天韵、刘韵若弹唱《三笑·追舟》



■ 蒋月泉弹唱《玉蜻蜓》

档。双档的形式更生动，更活泼，便于演员分别起角色，弹唱方面也使音色、伴奏更为丰富多彩。在演出形式方面，突破了一档独做的方式，更多采用评话、弹词相间的三四档同场演出的花式场子，以适应都市听众的多种口味。30、40年代时，评弹还大胆吸收了昆曲、京剧、电影、话剧、歌曲等姐妹艺术的营养，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段和音乐语汇。艺术手法除“说、噱、弹、唱”之外，还适当增强了“演”的成分。朱耀祥、赵稼秋弹唱《啼笑因缘》时，借鉴文明戏的表演方法，以说、表、演为主，获得成功。不少艺人向昆曲、京剧吸取营养，如蒋月泉、



■ 昆曲名家徐凌云(左二)、俞振飞(右一)与杨振雄(左三)、杨振言(左一)谈技论艺

张鉴庭、杨振雄、顾宏伯等还专门请戏曲演员教戏，训练手眼身法步等表演技巧，借鉴并融化到评弹中，以补说、唱之不足，给人以更多的实感。范雪君在弹唱《秋海棠》时借鉴电影，引进了“国语”和流行歌曲，别开生面。评话演员张鸿声针对都市生活节奏快的情况，加快书路行进的速度，并起足脚色，注重放噱，他的“飞机《英烈》”颇受欢迎。

弹词流派唱腔也蓬勃发展。以前弹词的唱腔，主要是书调、陈调、

却采用马调，因此俗称“俞头马尾”。演唱时真假嗓并用，唱腔挺拔遒劲，扣人心弦。徐云志所创的徐调，直接渊源是小阳调，吸收了江南民歌，小调、小贩叫卖声的旋律，还借鉴了京剧女老生露兰春的唱腔，清越、甜润，软糯，人称“糯米腔”，风靡一时。蒋月泉所创的蒋调，是在乃师周玉泉周调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蒋吸收了京剧老生余派、杨派唱腔的因素，行腔上加了若干装饰音，其旋律浑厚婉转，韵味浓郁醇厚，演唱时用本嗓，呈现出一种雍容华美、激

俞调、马调以及一些江南民间小调。到了30、40年代，一些有创造意识的艺人结合所演书目的内容、人物以及自身条件，又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唱腔。如夏荷生所创的夏调，响弹响唱，以俞调为起句，落腔

艳浓彩的风格。蒋调于30年代后期形成，立即受到听众欢迎，蒋调开篇《刀会》、《杜十娘》、《宝玉夜探》等十分风行，遂成为最常用、流行最广的弹词曲调。沈俭安所创的沈调，和薛筱卿所创的薛调，都是在马调和魏(钰卿)调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成的。沈调结合哑糯的嗓音，唱来清雅飘逸，苍劲而柔美，《方卿见娘》、《打三不孝》都是他的代表作。薛调则节奏明快爽利，咬字铿锵，擅唱叠句。沈调和薛调流传极广，亦为评弹主要的流派唱腔。张鉴庭所创的张调，在蒋调的基础上吸收京剧老旦唱腔的成份，在拖腔转腔方面加以发展，形成苍劲厚重、力度强烈的风格特征。此外还有严雪亭所创的严调、杨振雄所创的杨调、祁莲芳所创的祁调等。众多流派唱腔的出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弹词音乐，大大加强了其音乐性和戏剧性。■

第21届田汉戏剧奖揭晓 本社推荐作品分获一、二等奖

第21届田汉戏剧奖评奖颁奖活动于6月24日至28日在浙江省义乌市举行，参加本届评奖活动的戏剧杂志社有《戏文》(浙江)、《安徽新戏》、《戏剧丛刊》(山东)、《剧影月报》(江苏)、《福建艺术》、《影剧新作》(江西)、《东方艺术》(河南)、《艺海》(湖南)、《戏剧文学》(吉林)、《剧作家》(黑龙江)、《戏剧艺术》(上海)、《大舞台》(河北)和《上海戏剧》。

第21届田汉戏剧奖开幕式于6

月24日上午举行。会上，田汉基金会长邓兴器传达了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为田汉戏剧奖的题词：“绿叶无华，默默奉献”。田汉研究会秘书长沈毅宣读了田汉研究会理事长苏叔阳的书面发言。出席开幕式的还有金华市、义乌市、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有关领导以及各杂志社领导。

经投票选举，《戏文》杂志社主编徐沙担任田汉戏剧奖组委会秘书

长。会上还原则通过了田汉戏剧奖组织章程及评奖细则。

经第21届田汉戏剧奖评委会评议，最终评出获奖剧本24部和获奖论文28篇。本刊推荐的剧本《红拂》(小剧场京剧，作者邹平)和《玉卿嫂》(越剧，作者曹路生)获剧本一等奖；论文《站在田汉故居前》(作者章骥)获论文一等奖，《在戏曲发展的困境中培养新生代导演》(作者宋捷、万红)获论文二等奖。